

楚图南—跨世纪的探索

K827.7/118

楚图南——跨世纪的探索

楚泽涵 楚泽湘 楚泽洋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000090653

· 387055

版式设计:相 彬 衡永济
封面设计:金 南
封面摄影:柳 琴
责任编辑:胡云富 侯 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楚图南:跨世纪的探索/楚泽涵等编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3
ISBN 7-303-04159-1

I. 楚… II. 楚… III. 楚图南-生平事迹-摄影集 IV. K82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18493号

楚图南——跨世纪的探索
楚泽涵 楚泽湘 楚泽洋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875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05工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12 印张:17 字数:400千
1996年4月北京第1版 199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ISBN7-303-04159-1/G·2917
定价:85.00元

历尽人间无量劫 依然默默自耕耘

——对父亲楚图南的回忆

楚泽涵 楚泽湘 楚泽洋

父亲生于1899年8月，即旧历己亥年7月，是上个世纪末一年生人。父亲出生在云南省边远的山寨——文山县城一条很短的街上，门前有一条约两米宽的石板路，路两侧各有一条阴沟，上覆以石条，当地人十分形象地称之为“三步两座桥”。这个地名一直延用至今。

父亲的祖上据说是随明朝沐英入滇定居在建水一带的客籍，在云南的红土地上繁衍生息。后来避清军镇压回民杜文秀起义的战乱，迁往开化府（文山县旧称）。祖上原是大家族，但各房子孙贫富各异。我们祖父这一支则属清贫一流，曾祖早逝。祖父在戊戌变法后同情康梁，曾追随蔡锷在滇南某县任职，后来信服孙中山的学说，与友人在昆明创办《云南旬报》，长年在外。父亲6岁时祖母病逝。父亲的一个妹妹因家境困难养活不起，送给了城外山区的一户苗族人家收养。直到六十年代，父亲才找到失散40多年的妹妹。由于家境贫寒，父亲只能依赖亲戚，在家中帮佣，放过猪，放过牛，帮人舂米，稍大后从文山城南盘江挑水进城售卖，同时先在私塾陪读，辛亥革命后又进文山新办小学就读。父亲14岁时，收养父亲的亲戚已无力照顾父亲了，只得给父亲两个银毫子，打发父亲去省城昆明找祖父。父亲跟着从文山出发的马帮到蒙自，沿滇越铁路辗转到了昆明。先是在一家店铺中学徒，至年考入昆明私立联合中学。当时学校规定凡考试前三名者，免下学年学费。父亲为维持学业，除了要在店铺打工维持日常生活外，更加发奋用功，年年大考争第一，得以免学费直至中学毕业。1919年毕业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在昆明举行预考。父亲因师范学校不仅免学费，还可向云南省教育厅申请官费，遂报名应试，并被录取，接通知到北京复试。正当父亲为没有进京的路费而发愁时，得到云南一位耆旧的资助。当时北京高师在云南每年录取的新生也就是三至五名，这位老人听说一位穷学生被录取而无路费进京时，曾表示：“三遗子弟得以进京师求学，是桑梓之幸”，便慷慨解囊捐赠了60块大洋作为进京路费及置办衣物之需。这位老先生，可惜我们忘记了他的姓名，他在当时确实作了一件好事。父亲于是与一位姓杨的同学结伴，经越南（当时称为安南）的海防，乘船经广州至上海，然后乘火车北上。火车行到天津时，旅费用光了，被迫暂留在一处叫“泰安栈”的小客棧里。同行的杨某，因家道殷实，也许是出于“竞争意识”的考虑，并未给父亲任何援助，径自一人去了北京。滞留在天津的父亲焦虑被客棧老板看出，老板姓王，也是勤劳出身，自言其祖上在患难时曾得助于云南人士，因此以借的名义掏出五块大洋资助父亲进京。父亲到北京后，借寓宣武门外的云南会馆。其时虽复试时间已过，但还是给了晚到的预考录取生一次机会。只是父亲原拟报考的西语系招生已满，惟有改报尚有名额的史地系了。此时父亲的压力是十分沉重的：若复试落榜，则无路费还乡；留在北京，一个外地青年无亲无友更为困难。但父亲极为冷静而从容地准备复试：每日早起把过去的教科书目录翻检一遍，然后认真回忆这些章节的内容及要点，并将这些要点连贯起来，加以记忆。这样父亲凭中学时扎实的基础及功力，顺利地通过复试，被录取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系的新生，搬进和平门外的学校宿舍中，开始了新的求学之旅。

父亲的童年、少年时代是在艰难困苦的生活重压下度过的，但这锻炼了父亲的勤奋、进取的精神，以及“每逢大事有静气”的应变能力。虽然家乡的贫困经济、社会生活的不平等，给父亲留下深刻的烙印，但家乡的山水风光，淳厚、朴实的民风一直温暖着父亲的游子之心，他在80岁时曾写过两首诗，作为对家乡的怀念：

滇山云影映湖光，万里乡心入梦长。追忆南天春不老，繁花遍野四时香。

这一首记的是昆明。还有一首是：

千峰万壑远连天，峡谷林深啼杜鹃。回荡鸟语声声唤，畴昔征人犹未还。

这一首记的是他从14岁离开后再也没有回去过的、始终使他魂牵梦萦的文山故乡。

二

父亲1919年秋季进入北京高师时，正值“五四”运动的后期，各种政治、学术观点的争论很激烈。父亲很快为北京活跃的气氛所感染，开始了新的学习、思考和探索。但是首先碰到的仍是生活费用问题。父亲被录取后，即向云南省教育厅申请官费，但北京至昆明路途遥远，邮电通信很慢，快入冬时才接到云南省教育厅汇来的首期官费，好像是从事预考录取算起，先按半年发给，共寄来近50个大洋。父亲除还清了天津“泰安栈”的借款，补交了每个月三块钱的伙食费，还有余钱可用于置办过冬的衣物和购买书刊、文具。他在和平门至前门一带整整转了一个星期天，左看右问，最后只花了

一块多钱，买了一双棉鞋、一个枕头，抱回学校宿舍。他不得不为日后生活精打细算。

有一次，学校附近的书店到了一批外文书，其中有一本是英文版的房龙著的《世界地理》。据父亲说，这本书既有地理知识，又涉及历史、文化，看这本书同时还可以学习英语。可惜当时的积蓄已不够支付这本书款了，于是每天都去书店看看，唯恐这本书卖完了。随着存书的逐渐减少，父亲的焦急日深。所幸书架上的最后一本，一直摆着没有售出。等父亲收到又一个月的官费后，立即兴冲冲地赶往书店，买回了这本最后的存书，回到宿舍一看才明白，原来这本书有几页漏印了，是一张空白。父亲只好借来别人的书，用工整的英文将漏印的抄补上。这本书为父亲所珍惜，一直在我们家中保存着。这本书的前言是“两座大山的对话”。在我们幼年时，父亲就很真挚地对我们讲阿尔卑斯山与喜马拉雅山那生动的但寓意十分深刻的对话。到我们都作了父母，又见父亲拉着幼孙辈的手，神往地对他们讲“两座大山的对话”。慢慢才明白，父亲是教育后辈：人生是短暂的，与大自然相比，甚至还有些渺小，因而要珍惜时间；同时看事情要有“大山对话”那样的高度，以历史的高度观察现实问题。

父亲说，当时有一句顺口溜：“穷师大，富北大，洋清华”。意思是北京高师的学生多为家境贫寒。这些穷学生自发地办起了“工学会”，开始是课外学习互助性组织，后来又成立了贩卖部，利用课余时间经售书刊、杂志、文具什物。年终结帐时每个学生还可分到少量盈余，补贴平时零用。父亲参加了这个“工学会”，这样既有机会免费看到一些进步书刊，也接触到了更多的青年同伴，就从这个时候起，父亲和一些伙伴开始读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的文章，读到过《新青年》、《语丝》一类杂志，并开始接触李大钊，当时父亲称呼他为李先生、守常先生、守常师，并在李大钊指导下办过一种八开的铅印小报《劳动文化》。由于组织，也结识了蔡和森、施存统（后改名为施复亮）、许兴凯等人，也从李大钊处得到一些共产国际代表带来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小册子。父亲从这时起，开始了更深一层次的学习和探索。

对从亚热带边疆来到北京的人，冬天是难度过的。父亲不习惯北方的风沙和寒冷，高师四年寒假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比宿舍暖和的图书馆里度过的。暑假则邀几位同学在西山大觉寺等处赁室暂住，一方面远足交友，一方面读书练习写作。从1920年12月至1923年3月，父亲在求学期间，在高师校办的《史地丛刊》、《教育新刊》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仅现在收集到的有10余篇，其内容涉及到美学、心理学、教育学、民族学，还有关于知识分子和劳工群众结合、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论述等。在这一时期，父亲尽可能的多看书，同时练习写作，藉以表达自己的观念，并深入思考问题。父亲写道：“民国九年暑假，同学中回家的很多，唯我以路远不能归，移住西山。西山虽高，爬上山顶，望不见家乡，于是拿笔写些在家乡所见所闻的事情……；借此机会，又可以将云南土人的状况约略介绍，引起同志的注意。”父亲在记述了云南边疆十几种少数民族的分布、衣、食、住、谋生方式、语言文字、婚丧习俗、节令、宗教等十分广泛的内容后，对当时歧视少数民族“动不动讲‘华夷之分’，动不动讲‘攘夷狄，尊中国’”进行了抨击，并为他们鸣不平说：“中国的文化，或许有一部分是袭取这些土人的，或许受了这些土人的影响。”进而提出：“人类的新教育，人类的新文化，这是劳动阶级不能放弃的使命。……新时代有胆量有魄力青年创造啊，请大无畏的团结起来，突破黑暗，建造我们的新理想。”

三

1923年秋，父亲在北京高师毕业后，按当时对官费生的规定，返回云南。旅途中他又去过海源阁和天一阁等我国的著名藏书楼参观，并购置了一些书刊带回云南。父亲当时十分欣赏司马迁，佩服他不畏远途的抗争，忠实于自己的观念，坚守自己事业的精神。他结合司马迁的经历和自己的体会，总结为四句话：“读万卷书，走万里路，交好朋友，做大事情。”以此自勉，并鼓励青年学生。他先在昆明的省立一中、昆华女中、私立成德中学任教，后又到了北方，并受李大钊委派，到东北，先后在哈尔滨、吉林、长春的一些中学里广泛接触青年学生，和学生们一起读书、讨论，探讨民族生存、社会进步的道路。

父亲对青年有热情，自己又肯读书，勇于接受新思想，因此不论到哪里，进步的青年学生都愿意接近他，一些教师也视他为知己。至今还有不少当年父亲的学生回忆起当年在父亲教育和影响下，奋而投身救亡，献身革命的往事。1930年东北发生特大学潮，父亲的几名学生是带头砸毁长春市教育局的为首分子，因而被捕。由于在被捕学生的信件、日记中记述有父亲的行踪和言论，父亲在哈尔滨以“共党要犯”的罪名被捕，械押到吉林，在军法会审面前，父亲机智的保守了机密，使故人没有任何证据，因此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为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十一个月。后来才知道，吉林的当局原拟判父亲死刑，后因审讯中无罪证，也由于关内外一些同志、朋友和同情者的援救，才改判为二等有期徒刑（十年以下）的“满贯”。直到伪满薄仪登极，遇赦出狱。

在四年多的监狱生活中，父亲没有忘记学习和探索。他每天给同案的青年学生讲课，辅导他们学英文，凭记忆给他们讲历史，讲先秦诸子，讲司马迁和《史记》。同时父亲还通过朋友，从外面送进一些英文书刊，自己看后推荐给难友们。父亲用难友们抽的一种“黄狮子”牌的劣质烟的纸盒，拆开压平并订成本子，用来译文章，写作杂文，并托朋友带出去送交发表。在监狱的几年，父亲系统地研究了日本著名学者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从而补上了原来所知不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知识。并且翻译了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语录体式的名著《查拉斯图如是说》以及自传体的《看哪，这人》。

父亲在题记和译序中写道：“我是在扣着铁的牢门，在死的战栗中，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译下了这东西。”对于这两本书的出版，父亲写道：“这令我有着将被折断了一只钢箭，终于又投射出来了那样的欢喜。”“在钢箭的前端，也还愿意绑扎着投射给这时代的一封短短的消息……我们兄弟们在，在最遥远的海上没被探险过的国土！我吩咐你们向着那里扬帆前进！”

后来,父亲对我们谈起过他对尼采的理解,尤其是“十年浩劫”期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青年的无知对他发难,父亲起而作答:当时介绍尼采,是因为尼采反对现实。父亲在牢狱铁门的“铁的严肃”及可能判处“死刑”的“战栗和大宁静中”,当然极为仇视他所处的环境。此外尼采向往未来,有理想,有热情。尽管不同读者对这种理想可以有自己的理解。父亲在《看哪,这人》的译序中曾这样说:“经过战栗和斗争,度到更遥远的未来,光明的未来,那伟大的‘日月’……我就是以这种精神,这种意味,尝味了尼采,他也帮助了我在死和黑暗的严肃与无助中,度过了一段绝望和幻灭的生活。”

父亲将近五年铁窗生涯,完成了不少翻译著述。而且在逆境中保持了对未来的乐观、积极的态度,保持了自己的信念和进取精神,锻炼了意志。父亲以前曾对我们讲过:“在困难的环境中,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质。”

四

出狱后,父亲立即离开了东北,先到河南,在开封的北仓女中任教,后又到上海暨南大学任教,在此期间父亲完成了《地理学发达史》的翻译,译完了俄国名诗人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并开始翻译整理过去在狱中翻译过的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作。

1937年底,日寇占领上海,父亲携妻小离开上海经香港及越南回到昆明,开始了他一生中的又一个重要时期。

在外多年的父亲,回到家乡的红土地,感慨是很多的。岁月的流逝,国家经历了巨大变化,半个中国已沉陷在日寇铁蹄下,望着故乡面貌依旧的滇山云岭,怀念着被日寇蹂躏的白山黑水,向往着中华民族发祥地的中州黄河,面临外抗强敌、内反独裁的时代责任,凝视着依然蒙昧落后的乡村和家中贫病的妻小,父亲的心情是沉重的。

父亲任教于云南大学,并先后任在昆华师范学校、云大附中学校作兼职教师。但父亲的主要精力仍然是从事抗日救亡、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社会活动。当时父亲和他的同志们重任在肩:为团结对敌,既要说服本省人克服对外省人的排斥心理;又要说服外省知识分子摒弃对本地人的轻视。既要争取像张冲这样出身于绿林,后投身于军旅,在台儿庄率滇军浴血奋战的血性汉子;又要团结像闻一多这样留学海外,曾醉心于美学的学者文人。既要帮助一大批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又要团结一些家道殷实的实业界人士。既要利用龙云和蒋介石的矛盾,争取他对民主运动的理解和支持;又要利用关系和杜聿明这样的蒋介石嫡系周旋。既要谈天下大事,又要做学问。那时父亲正值壮年,他以诗人的热情,学者的睿智和战士的赤诚,全身心地投入火热的斗争,为开创昆明大后方的抗日救亡局面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紧张的抗日救亡,教育组织青年学生从事各种活动之余,父亲不辍笔耕,除了整理出版德穆生等的名著《地理学发达史》外,还翻译出版了惠特曼的诗作《大路之歌》,又出版了杂文集《刁斗集》。父亲在“刁斗题记”中写道:“逻辑回滇以后所作杂文,命之曰‘刁斗’,这与其说是抗拒前方的敌人,宁宁说是要警惕后方的黑夜。”“我愿听着刁斗冷肃的声音,知道我是生长在斗争着的时代”,“但我知道大地并没有熟睡,中国也在重重艰苦的斗争中活着”。这些都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

在父亲另一部杂文集《旅生杂记》中,记述了“沉默而忧郁的涵谷古道”,“魔窟如云”在古城头上的俯冲,松花江巨流……和江上的红火的落日”。这无疑是一个战士对过去战场的回忆。后来有人在评论父亲的著述时说:“他是动乱时代中一个特具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具有一种悲剧精神,在他的言论中常常启示着一种强有力的象征。他所介绍的诗人,所谈论的人物,无不具有一种高贵的气质,给人一种精神上莫大的感染。”

父亲对朋友是坦城而直率的。抗战后期,闻一多先生已是与父亲无话不说的朋友,每逢他从西南联大下课来我们家小坐,当时颇顽皮的泽涵,或揪他的胡子,或将其手杖藏匿,不愿让“一多伯伯”离去。父亲曾回忆起一次与闻一多讨论过对新月派的评价问题。当时闻一多在历经清华大学迁徙到昆明的千里路程,沿途所见的人民的苦难深深刺痛了他,他开始和“高等华人决裂”,开始“长大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对新月派的唯美主义也开始怀疑,但还不十分情愿与之决裂,因此与父亲讨论过这些问题。面对父亲的近于尖刻的评论,闻一多首先是感到父亲的真诚和坦率,同时也悦服于父亲的道理,他说,在此以前还没有听到过这样中肯和尖锐的批评。

在李公朴和闻一多惨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无声手枪下后不久,父亲被迫离开了昆明,又到了上海,经沈钧儒介绍,任教于上海法学院。

当时父亲从事民盟的工作。由于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要独裁的本质,父亲向往到“山那边”——解放区去。当时这条路途还是充满风险的。为了准备这次远行,父亲除了与在上海及香港的中共的同志们联系外,还尽量深居简出,挤出时间从事《希腊神话和传说》的翻译,一方面可从预支的稿费中筹集旅行的费用,也是准备在有些不利时为母亲及孩子们留一些生活和求学的费用。1948年底,父亲在一名青年陪伴下,离开上海,取道天津,从陆路经沧州进入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父亲走后,母亲用父亲留下的稿费,冒着风险买了一台美国造的短波收音机,经常在深夜收听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父亲离家于1948年冬日,我们通过广播在等待,在寻找那春天的声音!

五

1949年5月上海解放。6月,早先进入解放区的大哥泽清(当时改名楚庄)到上海接母亲和我们弟妹到北平。这是我们全家的第一次团聚。此后父亲投入新政协和建国的筹备工作,建国后又受命到西南负责文教方面的工作。直到1953年大行政区撤销,父亲又调回北京,先是担任扫除文盲的

领导工作，后来又担任对外文化交流方面的领导工作。

在父亲毕生花费精力和时间最多的民间外交工作中，他更是发挥了他在知识结构上的长处。他可以同欧洲的朋友讨论希腊神话和尼采，同苏联朋友讨论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同美洲朋友讨论惠特曼的《草叶集》，同日本朋友研究中国的书法和儒学。他和赛鲁达、亚马多、李约瑟、土岐善磨、茅诚司、井上靖等一批本世纪的著名文化人成了朋友。他在为向世界人民，尤其是世界各国的文化界介绍中国这个古老而又崭新的国家所发生的变化，为扩大中国和世界的文化交流而不遗余力的勤奋工作。

在此期间，父亲对他过去从事的研究和写作仍是一往情深的。刚从西南调回北京时，他购买了一批有关回民起义的文献资料图书，准备就边疆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作些研究。五十年代末，他还想根据过去收集的资料和解放后出版的书籍，继续他早年从事过的对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他出访过许多国家，而且留下每天的日记，这里不是活动的流水帐，而是中外人民友好交往的记录，也处处写下了他的心声。父亲很想把它加以整理。可惜因为工作忙碌，这些心愿都未实现。

晚年，他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可以从容地看一看书，想一些问题了。他很想研究一下如何从中国的儒家思想中找出一些能为现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起积极作用的東西。他关注国际形势发展，也曾想研究一下苏联解体给中国带来的教训。他也曾想写些有关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某些代表人物的专论，并收集了一些资料。可惜，终究父亲年事已高，精力不及，又体恤子女各有职守，不忍委托子女代劳，这些设想都没能实现。应该说，这是很遗憾的。

六

父亲的“业余”爱好是书法和旧体诗词。抗战期间，住在昆明市郊，工作之余，父亲用看过的报纸临摹碑帖，练得最多是前人所拓的“礼器碑”。其实父亲喜爱并临习汉魏碑帖的经历可上溯到他的青少年时代。

建国以后，虽闲暇时间不多，但一有空闲总是写写字，除临碑帖外，有时抄写唐诗。即使出国访问，也不忘带一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十八家诗抄》。六十年代以后，又多了一本《鲁迅诗稿》及一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都是文物出版社出的线装本。父亲酷爱旧体诗，偶尔也写下几句，但一般不示于人。

1976年金秋十月，“四人帮”被捉起来后，父亲在对外文委留守处的庆祝会上当众朗诵他的诗作：

一声霹雳，清除四害。举国欢腾，百姓称快。

据我们所知，这是父亲首次对公众发表他的诗作。这以后父亲的诗作多了起来。用他自己的话说，以前他写字多是抄录前人章句，现在他想到，他所经历的时代比前人丰富得多，体会也深刻得多，因此今后要写自己的东西。以后每有诗作，他先写在线装竖格本上，然后反复修改。

我们的母亲在1979年去世后，写作诗词也成了父亲寄托感情的一种方式。这时已80岁高龄的父亲，诗作和书法创作十分活跃。在他笔下有年轻时搏击的记录，有对历史的严肃的思考，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家乡山水的怀念，有对同志、朋友的真挚情意。从父亲的旧体诗词中我们就感到他在早年杂文中所表现的对理想境界锲而不舍的追求，对世界上不合理现象愤疾的悲剧精神，一种自己奋力而又激励别人进取的力量。父亲在90岁前后所作的一首秋词是晚年心境的一种很好写照：

秋园秋光映夕阳，满园花果正飘香。暮年夸父犹追日，皓首丹心勉自强。

父亲对于著述从来是严谨的，他过去的文集、诗著，从不请人题字，也不找人作序。父亲认为作品的好坏是考验作者自己的功力，而不宜请人题字作序以为帮衬。但是晚年的父亲这时却接受了一些难以推辞的“工作”如为一些书题名、作序，为一些纪念馆、文化遗址题词、题句。这是人家出题目，父亲交卷。对这一类任务，父亲总是十分认真的。

湖北省为黄侃先生纪念馆索题，父亲允诺后，先是找来一些评述黄侃的文章阅读，还特别仔细地阅读过我们的舅舅杨伯峻纪念黄侃、回忆早年师从黄侃治学的文章，然后认真思考，题写了：

博闻强记，夙观自异。特立独步，卓尔不群。

这16个字，概括了父亲对一代学人黄侃先生的理解和评价。

十年前，父亲看到旅法华裔美术家熊秉明（父亲故友熊庆来先生的儿子）的雕塑作品“老牛”。这件作品上，用现代派的手法处理得如同老松树的粗砺树皮一样的体态。父亲为其题写了如下—首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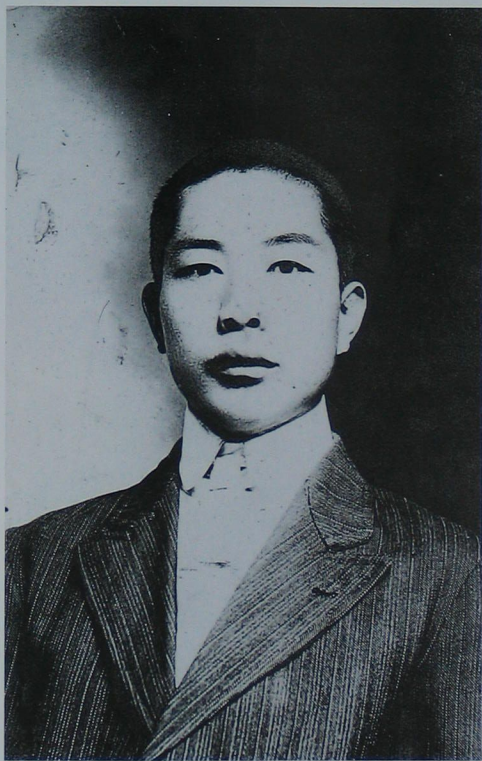
刀雕斧凿牛形成，百孔千疮悟此生。历尽人间无量劫，依然默默自耕耘。

这实际上是父亲的自况，他的一生经历了我们这个世纪血与火的沧桑变化，他的经历中颠沛流离和种种坎坷，也算是“历尽人间无量劫”，但父亲始终是“依然默默自耕耘”，淡泊名利，不断的思考，不断的激励自己，勉励后人，要造福人类，要为社会进步不断的搏击进取！

父亲的品德是后代最可宝贵的财富，仅以这种认识，我们记下父亲作为大时代中一个知识分子的经历和命运的片断，以此作为对先贤不逝的怀念！

1899—19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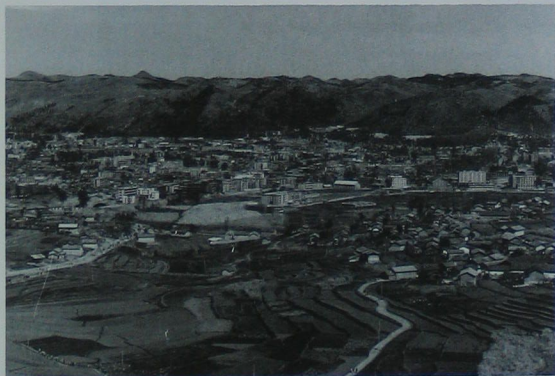
上个世纪最后一年，楚图南出生在云南边陲文山县一个贫苦的家庭中，幼年经历了民族和贫困的灾难，萌发了爱国意识。早年在昆明求学，五四运动后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接触过李大钊、蔡和森等先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自觉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有觉悟的知识分子。





1. 楚图南 1899 年生于云南省文山县,图为三十年代文山城外景色,远处为西华山,城镇周围有南盘江流过。

2. 八十年代初,文山城远眺。



滇山雲影映湖光
 萬里鄉心入夢長
 遙憶南天春不老
 繁花滿野四時香
 千峰萬壑遠連天
 峽谷林深啼杜鵑
 回蕩鳥語聲聲喚
 皓首征人猶未還
 鄉心兩首 楚圖南

3. 楚图南晚年怀念故乡的诗作。
 “乡心两首(1980年11月)
 滇山云影映湖光,万里乡心入梦长。
 遥忆南天春不老,繁花满野四时香。
 千峰万壑远连天,峡谷林深啼杜鹃。
 回荡鸟语声声唤,皓首征人犹未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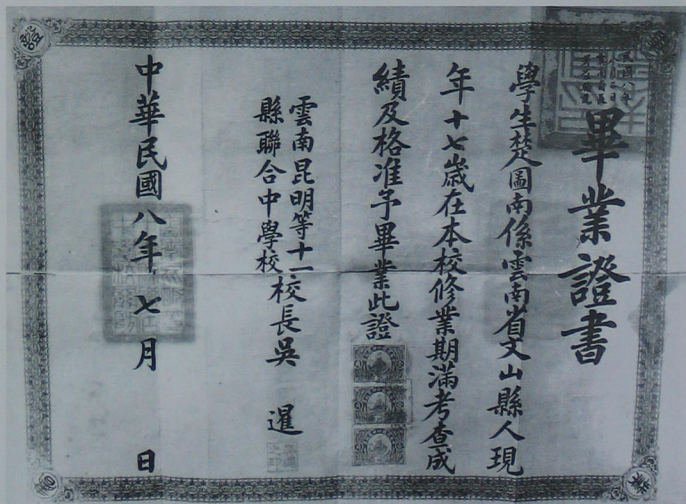
4. 楚图南生在一个贫苦的农家。自幼丧母，依附亲属帮佣为生，并在私塾陪读。图为楚图南出生的房舍（现为民居，摄于1984年）。



5. 楚图南出生地房舍外街景（摄于198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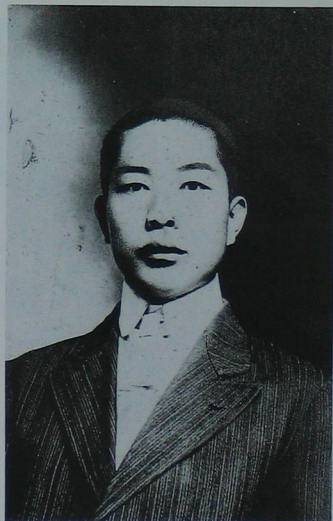


6. 在昆明联中毕业时的楚图南(191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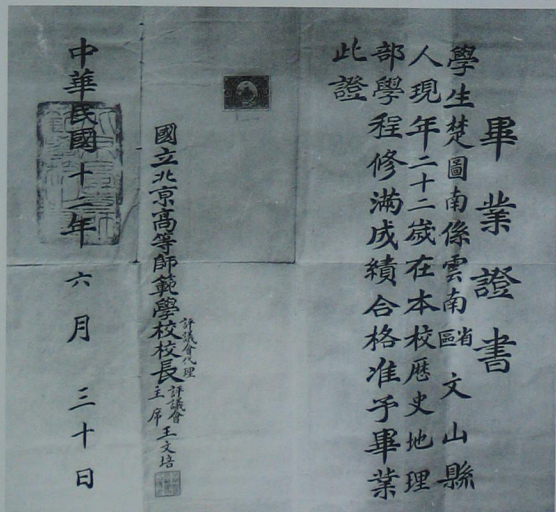


7. 1913年楚图南离开文山到昆明,1915年考入昆明等十一县联合中学,191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图为联中毕业证书(其中年龄有误,应为十九岁)。

8. 1919年楚图南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史地系。图为在北京求学时的楚图南。



9. 图为楚图南1923年在北京高师的毕业证书。



開化旅京同鄉歡送楚君圖南畢業赴皖紀念十二年三月



10. 北京高师求学期间，楚图南参加了工学会，接触了李大钊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1922年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SY)，在李大钊指导下编辑《劳动文化》小报，开始走上革命道路。1923年在高师修业已满，赴安徽阜阳实习。这是楚图南(左二)赴安徽前与在京的云南文山(古称开化)同乡合影。照片后面写道：“1984年2月24日，原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学欧阳和之弟欧阳成自文山寄来。……这张已六十多年前的照片，可惜当日的人一个也认不清，也不能说出他们的姓名和所学科目。时光逝如流水，徒增人感慨而已。

1984年3月6日记。”

“据来信，照片上的人有：

周寿松任文汉(字宏江)

崩德荣(字荫棠)任准中(字学海)

钱思会”

1924—1949

1923年楚图南从北京高师毕业后，先后在云南、东北、山东等地，以教师的身分在青年学生中进行工作，根据李大钊同志“广种薄收”的指示，通过大量的教育、宣传，发现革命力量，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而斗争。三十年代初，在东北被反动军阀政府逮捕入狱。面对死亡和长期徒刑的威胁，楚图南团结同志，坚持斗争，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继续教育学生，并从事翻译及著述，出狱后，在河南、上海及云南为抗日救亡，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积极工作，为新中国的诞生，奋斗进取！





11. 1924年昆明昆华一中教职员合影，右一为校长徐继祖，左二为英文教员陈小航（即翻译家罗稷南），右四为文史教员楚图南。



12. 楚图南在昆明省立一中、昆华女中、私立成德中学任教。图为1925年11月与家人合影，后中立者为楚图南，前右二为父楚晓棠，左二为继母晋氏。



13. 根据北方党组织的通知,楚图南于1926年到东北以教师为职业掩护,从事党所委托的工作,并由李大钊批准转为中共党员。图为1927年七月在吉林市第六中学任文史教员的楚图南。



14. 1927年吉林六中校舍(南楼)外景。



15. 楚图南在东北广泛接触青年学生,帮助一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图为1929年在长春东土门岭与长春二师的学生合影。右二为楚图南,左三为孙铿(肃先),后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在与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斗争中牺牲,被迫认为烈士,后立者为郑健(康),大革命时期的党员,解放后曾任吉林省计委主任。



16. 1929年在长春二师任教时和师生们在足球场上(前左二为楚图南)。



17. 1929年10月楚图南(站立者左八)和参加秋季运动会获胜的长春二师学生们。